



#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事實問題 ——論西方漢學研究

P.11-13

**Postmodernism and Questions with Historical Facts:  
Western Chinese Studies**

布萊茲尼 (Lev A. Berezniy) 撰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系  
Department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鄒定嘉 (Yen Ting-Chia) 譯

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Russi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以研究中國社會史聞名的《現代中國》雜誌主編黃宗智先生指出，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在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早已有了出色的表現，相對而言，其在文化研究及西方漢學研究中，卻姍姍來遲。<sup>1</sup>他認為，這首先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sup>2</sup> 的出版有關。該書曾引出各種互相對立的評論；雖然《東方主義》自 1978 年問世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然而關於它的論戰仍方興未艾。

限於篇幅，本文對薩依德的基本思想不另贅述。筆者僅提出以下說明：從眾多的討論材料中可發現，反對史學實證內容的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論主張，已遭到評論界的撻伐。薩依德相信，所有歐美關於東方的研究報告，都與帝國主義的歷史有關：由東方學家所構思出的東方的落後形象，代表著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合理性；西方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東方研究，都與帝國主義沾上邊，並成為其抬轎的工具，因此歐美的東方研究並不具有太多的實質內容；而當今的社會理論，特別是現代化理論，都延續著這樣的傳統，總的來說，東方研究

與政治意識型態擺脫不了干係。

黃先生提到，解構主義亦為後現代主義的一支，因此許多學者堅決否定薩氏的論點。他坦承，薩依德在針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這段「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所做的評論中，許多親帝國主義路線的部分論述有其公正性；但黃主編也堅持，二十世紀的東方研究，特別是漢學研究，在學術上已臻成熟，並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如此一來，在研究方法與結論的經驗論據上，要持更加嚴謹的態度。他還注意到，漢學家本身（特別是研究社會歷史的漢學家）也會批評帝國主義，況且多數的漢學家都親中國，而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的喜爱，常會超過對其本國文化的喜愛；因此吾人不能像薩依德一般，指責他們對中國的詆毀。

然而本文的目的在於關注後現代主義的另一項論述，它與後現代主義信徒的認知理念有關：反對史實認知的可能性，因為史學家所採用的只是他對史實的概念。

1 *Modern China*, n.2, 1998, p.193。

2 Said E. W., *Orientalism*, New York, 1978. 薩依德論著出版的同時，Geertz C. 類似觀點的作品也問世了，就是所謂的「解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他並在之後出版的文章闡述自己的論點。見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1978。



眾所皆知，史學家是否有詳實記載歷史能力，是史學研究中長久以來就面臨的難題。因此，許多學者都致力於克服此一難題，並將歷史知識的相對主義視為解決之道，其中最耳熟能詳的應屬法國「年鑒學派」，以及俄國的歷史研究者古列維奇（B. Gurevich）。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卻將相對論推至極端否定論，他們認為史實無法考證，因為史實乃史學家的主觀概念。薩依德本人就懷疑史實的可靠性，就他看來，所謂史實其實是由語言、文化、制度，以及作者本身所處的政治環境來決定的。可以將事實視為一種概念，並與其他相關情況交錯在一起，但在事實中唯獨不包括「真理」，因為真理也只是個概念罷了。<sup>3</sup> 而黃先生認為，若根據此種思考邏輯，則仔細蒐集歷史證據及文獻，還有解讀這些文件時所做的努力都失去了意義，因為除史學家的主觀概念外，客觀的本質也遭到否決；如此一來，史學家所匯集的史實證據，與他所捏造出來的事實之間，就沒有任何差別了，這二者之間只有虛偽程度的不同，它們都反映出史學家的文化定位，也只能充當其邏輯體系的一部分；況且在此情況下，社會科學理論幾乎全遭否決，因為它們都與西方有所淵源，也與帝國主義這一問題的解釋有關。黃先生指出，薩依德的分析方法與論點，都不給現代化、發展及民主化等問題預留探討的空間，因為後二者與殖民統治的規劃有關。這樣主觀的認定否決了對科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項原則：「探索真理」。《現代中國》的主編所選擇的是他一貫秉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他認為，歷史研究需要不斷地比較各種已經試驗及思考過的方法，在這過程中，理論有助於釐清歷史證據與研究者所持概念間的關係，因為理論作為研究的動機，可能將研究導向死胡同，或反之成為指引方針，如此一來，不可將它視為既有答案的根源。<sup>4</sup>

然而，就筆者看來，黃先生的論述中有許多互相矛盾之處。在綜觀意識型態對美國漢學研究的影響的同時，他斷然指出，美國學院派理論擁有極大的自由及自權，可以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禁錮，但他同時也承

認，這並不表示事實果真如此，其實學院理論並未完全擺脫意識型態，後者也因它其實是操控學院理論的幕後黑手，而更突顯了它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也給了後現代主義者一個史實不可考的最好論據。在與後現代主義者的論戰中，黃先生對直接承認歷史知識的相對主義，採取了規避的態度。

由此可以判斷，薩依德對史實問題所採用的主觀方法，決定了他對「東方主義」與帝國主義關係的看法；此一主觀方法反映了在西方社會思想中，後現代主義者對社會理論與事實間關係的解釋廣為流傳的現象。在薩依德著作出版的同時，費耶拉賓德的《反方法》一書，也以充滿反動的附標題「論無政府主義者的認知理論」<sup>5</sup> 於倫敦問世。筆者在此需略提此書，因為許多中國研究者，特別是以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歷史而聞名的迪爾力克（Arif Dirlik），經常引述該書。費氏認為，事實與理論間的關係，其實複雜多了，並不是根據所謂的「自主原則」，判定事實的存在並不仰賴於用來檢驗它們的二擇一理論。他認為，實際上就算每一個別的事實，都必須用各種理論來推演，更遑論用二擇一理論來辨明事實的真偽。因此，費氏認為，用來檢驗事實及其實際內容時所運用的方法論，其實是由各種部分相符，但整體而言卻不相容的理論所形成的。<sup>6</sup>

迪爾力克則視費氏論述的結論為該書的精華之處：歷史中「事實」的地位備受爭議，而這將使註解成為史學研究的主要依據。迪爾力克認為，這並不意味著歷史將成為文藝作品的變種；而史學家不能忽視研究者在必須考量用何種方法了解過去時，所可能產生的成見；因此在衡量史學家的角色時，還要特別注意他對待其所處時代的態度。

這個闡述，讓迪爾力克做出重要結論：歷史事件與史學家的工作環境，將影響他對研究形式及方法的選擇。迪氏認為：對專業自治，還有符合理論和「事實」之間的自治關係，無論是在研究形式的選擇上，或是在尋找「事實」上，常忽略了關於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

3 同前，p.272-273。

4 *Modern China*, n.2, 1998, p.203。

5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1978。

6 同前。



這一問題；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意識型態特徵，常被避而不談。<sup>7</sup>

除了意識型態這一因素外，在費耶拉賓德的著作中，還提及其他影響史學研究的因素。費氏堅信，二十世紀的科學研究已脫離哲學思想的範疇，在高薪、與上司及同事間良好關係等諸多誘因下，學者認知中的科學研究已變成了一筆大買賣。迪爾力克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即使在學院或其他「自由」研究的條件下，自我監督其實都與約定俗成的環境有關連。專業學者並非抽象的物體，而是活生生的人，從論文的撰寫，至確定到職期限，一直到升等；或從爭取補助到獲得出版研究成果的機會，這些人絕不會從理智角度來考量。<sup>8</sup>

在本次辯論的討論過程中提及，由於史學家個人喜好，而使歷史證據可信度面臨更廣泛多樣的問題，這樣的現象，更強調了歷史知識相對性問題的複雜性，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以後，此一問題更顯尖銳，這不僅與後現代主義者在漢學研究上的主觀見解有關，與歷史時間

的普遍加速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在中國新歷史的文獻編纂上，這不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激烈變革的速度有關，更與缺乏區隔研究者與其研究的事件或現象的時間距離有關。筆者更認為，這不僅與八〇、九〇年代的改革有關係，更與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有關，特別是後現代主義者及其反對者所強調的，即意識型態對史學家在做結論時所造成的影響，這種影響充分表現在對自清末以來「維新政策」、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說法上。因此常會發生因作者意識型態不同，對同一「事實」，做出各種大相逕庭的解釋的情況，例如：不同的作者，因其對美國政府對中國及臺灣關係政策認知不同，而做出各種完全不同的詮釋。

參與本次辯論的美國的中國史學家，雖然在史實問題上，並未得到共識，但卻更準確地釐清了在查明歷史證據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因此本研討會強調，對此一重要認知問題，必須要採取更深思熟慮的立場。

####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 16 種

## 英譯中文詩詞曲索引：五代至清末

本書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圖書館汪次昕女士繼「英譯中文新詩索引」後之另一精編工具書。全書蒐編五代至清末的中國古典詩、詞、曲之英文翻譯而為索引，共收錄 1999 年以前出版的英文譯作 6700 首，分屬不同作家 612 人，期刊 123 種。編排方式則按作者姓名漢語拼音排列，作家名下之譯作再依詞、曲中文原名的拼音為序。此外，本書特在主索引前將蒐集的譯作及期刊之縮稱依英文字母排列於索引首部，以方便學者檢索。鑑於英譯中國古典詩詞曲的作品日眾，本書的出版提供研究英譯中文辭章的學者一條檢索的便道，對有志中國詩詞曲的中外人士獻莫大之助益。民國 89 年 4 月出版。臺灣地區定價新臺幣 350 元，其他地區定價美金 15 元。(含郵資)

<sup>7</sup> *Modern China*, n.3, 1996, p.247。

<sup>8</sup> 同前, p.246。